

【区域经济理论】

高水平国际循环促新质生产力发展： 逻辑与实践路径*

戴翔 宋悦

摘要：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亦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2025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一系列战略部署，本质上旨在促进高水平国际循环的畅通，进而契合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政策取向。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逻辑审视，或从世界经济的历史逻辑考量，亦或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实践逻辑分析，生产力发展的本质意义可归结为“流动”。以“流动”为新的视角，开放环境下推动生产力发展离不开国际循环的畅通无阻。具体而言，流动不仅涵盖商品、货物与一般生产要素的流通，还包括发明和发现等创新性思想等高端要素的流动。后者在先进生产力的形成，特别是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抢占先机，发挥着主导和关键作用。因此，中国应当在畅通“硬件”互联互通、完善“软件”联接、促进“数字”流通、加强“产业”合作等方面进一步发力，以推动高水平的国际循环畅通，从而从根本上为加速推动和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关键词：国际循环；新质生产力；思想创新

中图分类号：F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5)04-0013-09 **收稿日期：**2025-03-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制度型开放提升制造业价值链韧性的机理、效应与政策优化研究”（24CJL014）。

作者简介：戴翔，男，南京审计大学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江苏新时代自贸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南京 210000）。

宋悦，女，南京审计大学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助理研究员（南京 210000）。

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其根本在于对现实社会中那些极为关键且具有前瞻性的新现象、新问题及新动向的敏锐洞察与精准捕捉（金碚，2024）。这种捕捉并非仅停留在表面现象的简单观察，而是深入探究现象背后的本质与规律，通过严谨且系统的理论提炼与升华，最终明确清晰地指出当前乃至未来一个时期内，中国经济发展必须牢牢把握和坚持的国家战略方向与政策导向。从“新质生产力”概念的形成，到《2025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下文简称《报告》）对其重要性的再次强调，充分表明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是对现有经济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更为未来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

论支撑和实践指南。改革开放以来，总结中国生产力实现巨大发展成就的经验，可归结为改革开放。因此，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政策取向看，进一步实现高水平国际循环，无疑是新发展阶段“以开放促发展”的重要路径选择。《报告》对“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做出的一系列战略部署，一方面充分表明，无论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等外部环境变化对中国发展的不利影响如何持续加大，坚持扩大开放的决心不会动摇，努力营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的步伐不会停滞；另一方面也表明，新阶段实施的更高水平开放，从本质上讲，就是在进一步促进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的同时，稳步扩大制度型

开放,以实现更高水平的国际循环畅通。由此自然而然提出一个具有显著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的课题:国际循环的顺畅如何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其内在逻辑究竟是什么?同时,在操作层面,应如何选择恰当的路径实现这一目标?

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社会生产与扩大再生产可划分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自改革开放伊始,中国经济循环的起点——生产环节,以及与经济循环终点——消费环节,均成为经济循环的严重制约因素。为此,中国坚定不移地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积极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持续扩大对外开放,以寻求发展的机遇。中国推行的“两头在外”国际大循环战略,既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又与经济全球化趋势相契合,有效把握国际分工变化的关键机遇,促进了生产力的迅速提升。在2018年4月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诚挚地指出,实践已经证明,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的条件实现的,未来中国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进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与关键所在(习近平,2024)。因此,从宏观视角来看,在更开放的国际环境中,推动国际大循环的顺畅运行,对于构建与提升新质生产力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甚至可视为实现此目标的必由之路。

一、国际循环与生产力发展的一般逻辑: 流动的新视角

为深入研究国际循环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促进效应,并在实际操作中选择合适的发展路径,我们有必要对国际循环在推动生产力发展中的普遍角色及其重要性进行简洁而深刻的分析与探讨。在此过程中,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国际循环的核心在于商品与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即其跨境的输入与输出。因此,为了深入阐释国际循环对生产力发展促进作用的普遍逻辑,本文计划从流动的视角对这一过程进行解析。

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阐释的理论逻辑

在对各种生产力发展理论进行综合分析时,我们能够明确地识别出一个普遍规律:这些理论均从不同层面或维度探讨如何提升生产要素或商品的

流动效率。从这一视角出发,生产力发展的本质可归结为“流动”。实际上,国内学者金碚(2019)在研究畅通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时,也曾明确指出“流动”对于促进发展的根本性作用。习近平主席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实际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早已蕴含了对流动与发展关系的深刻理解,以及流动对发展所具有的关键作用和意义。例如,深入研究《周易》,我们不仅能够发现其强调“流动”对于事物顺利发展的重要性,而且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对比分析,揭示了“流动”在塑造强大生命力与竞争力中的核心作用。

《周易》中乾卦所阐述的彖辞深刻地揭示了万物发展的普遍真理,即在阴阳二气的循环往复中实现“云行雨施”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标志着万物生长的起点,而且彰显了宇宙万物的主宰力量。所谓“品物”,指的是事物种类的多样性,强调了万物之间的类别差异。而“流形”一词,既指万物处于持续的发展变化之中,无物恒久不变,形态及其特征均处于不断的动态变化之中,体现了变化的动态性;又指从特定时刻观察,万物所呈现的具体形态与特征,都是在流动中逐渐形成的。在万物形成的过程中,“云行雨施”所代表的阴阳二气的输入与输出,进一步引申为信息、资源、能量等的输入与输出,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扮演着核心角色。从这一视角出发,任何具有竞争力的生命体或生态系统,必然是一个开放系统,它既包含各种信息和资源的输入,也包含相应的输出。这样的系统能够持续地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从而维持其活力与竞争力。这种开放性是生命体和生态系统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其适应环境、进化演变的关键。综上所述,所有事物的顺利发展无不彰显出“流动性”这一根本属性。

《周易》中的泰卦与否卦所体现的对立关系,深刻揭示了事物发展与演变过程中所蕴含的动态本质。泰卦的彖辞阐述:“泰,小往大来,吉亨。天地交,而万物通也。”泰卦由乾卦居下、坤卦居上构成,这一结构象征着天地之间的相互沟通与阴阳的和谐统一。乾卦代表天,象征阳刚之气,其本质特征为前进、扩张、上升;坤卦代表地,象征阴柔之气,其

本质特征为后退、收敛、下沉。通常情况下,代表“大”的乾卦应位于上方,而代表“小”的坤卦应位于下方。然而,泰卦的特殊结构却是乾卦在下,坤卦在上,这便是“小往大来”。这一现象反映了天地之间的相互沟通、阴阳和谐的动态过程。由于乾卦所代表的阳气具有上升的特性,坤卦所代表的阴气具有下沉的特性,因此上方的坤卦与下方的乾卦必然交汇融合。这种“天地交,而万物通也”的状态,是宇宙与人类社会中极为罕见的“亨通”与“安宁”的理想状态。《周易》通过泰卦的阐释,进一步揭示了“交”与“通”的流动性在事物达到最佳发展状态中的关键作用,这也是万物生长繁衍、生生不息的根本条件。综上所述,通过天地的相互作用,资源、信息与能量得以顺畅流通,从而促进了万事万物的繁荣与发展。这一卦象不仅是对自然现象的深刻洞察,也是对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理念的生动诠释。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周易》中的否卦从相反的角度阐述了缺乏流动性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周易》中否卦的彖辞指出:“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否卦由乾卦在上、坤卦在下构成,这一独特结构象征着天地的相互隔离以及阴阳的不交流、不贯通。如前所述,乾卦代表具有阳刚属性的天,其本质特征为前进、扩张、上升,而今已处于上位;坤卦代表具有阴柔属性的地,其本质特征为后退、收敛、下沉,而今已处于下位。因此,如果在上位者继续上升,在下位者继续下沉,则会导致“大往小来,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的局面。否卦通过阐释从安泰到混乱、从通畅到闭塞的转变过程,进一步从反面强调了在事物顺利发展过程中,“交”与“通”的流动性所扮演的关键角色。这种流动性不仅限于物质层面,更涵盖了信息、能量乃至思想的交流。在现实世界中,无论是社会的和谐发展还是个人的成长进步,都离不开这种动态的、相互作用的交流过程。缺乏交流会导致信息的闭塞、思想的僵化,进而影响整个系统的活力与创新能力。因此,否卦的教诲提醒我们,要时刻警惕那些可能导致隔离与闭塞的因素,积极寻求与促进各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以保持事物的生机与活力。

2. 世界经济发展呈现的历史逻辑

《中庸》这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中提到:“道,不可须臾离之,可离非道也。”实际上,《周易》所阐述的“道”,指的是事物发展演变过程中所体现

的动态本质,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审视世界经济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察觉,世界经济的成长过程或生产力的提升轨迹,本质上也是一个“流动”的过程。

当我们从全球经济发展史的宏观视角审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时,可以明确地观察到,水系的形成与分布对早期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特别是河流与湖泊的存在,显著地增强了人类之间的流动性,这一现象在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尤为显著。通过深入研究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早期文明的发源地往往集中在大型河流流域,这些地方因河流的滋养而生机盎然(马福运,2024)。例如,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印度河以及黄河等著名河流,它们不仅为周边区域提供了丰富的水资源,满足了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而且成为早期人类社会交流与贸易的关键通道。因此,我们可以坚定地断言,水系的形成在人类文明的初期阶段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不仅为人类生存提供了基础条件,还充当了文明交流与传播的关键媒介,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与融合。由此可见,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本质在于“流动”。

自古以来,人类对物质与商品流通的追求促进了流域文明与运河交通的发展,进而显著推动了经济繁荣和社会生产力的提升(黄承梁,2024)。随着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海洋文明随之兴起,海路的畅通无阻带来了全球化的流动。海洋文明的崛起不仅改变了人类社会的交通方式,而且在更深层次上影响了全球贸易与文化交流的格局。海路的畅通无阻使得远距离的货物交换成为现实,极大地丰富了各地区的物质资源,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同时,海洋作为连接各大洲的天然纽带,也加速了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与融合,推动了科技、艺术、宗教等多领域的交流与发展。这种全球化流动不仅提升了生产力水平,还催生了新的社会结构与思想观念,为人类文明的进步注入了强大动力。可以说,海洋文明的兴起是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力水平因此得到了快速提升。

自然,除海上交通的海洋文明促进了经济全球化,进而加速了全球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外,历史上陆路的全球化流动亦扮演了关键角色,例如丝绸之路等。这些陆上通道在古代文明中同样发挥了至关重

要的作用,促进了东西方之间的贸易与文化交流。丝绸之路不仅是商品交易的路径,更是思想、技术、艺术交流的纽带(周建新,2024)。通过这条路线,中国的丝绸、瓷器等商品被输送到欧洲,同时欧洲的玻璃、香料等商品也传入中国。这种双向的交流与互动,不仅推动了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还促进了科技与文化的进步。此外,陆路通道也为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与融合提供了平台,丰富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因此,无论是海上还是陆上,全球化流动在历史上对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类文明的进步都发挥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综上所述,世界经济发展史生动地展示了生产力发展的“流动”特性。

3.中国改革开放彰显的实践逻辑

在前文的分析中,已明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融入国际大循环的流动过程。更精确地说,在前一轮以商品和要素跨境流动为显著特征的对外开放过程中,生产力实现了巨大的飞跃。在此过程中,中国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优化资源配置,迅速提升了产业水平和竞争力。特别是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中国进一步加深了与全球市场的融合,吸引了大量外资和技术引进,推动了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型。此外,还通过建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等一系列政策措施,营造了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外部环境,即通过构建开放载体以促进商品和要素的跨境流动。这些措施不仅推动了国内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生产力的发展,也为全球经济的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商品流通的角度审视,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1980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仅为381.4亿美元,其中出口总额为181.2亿美元。至2023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已增至59359.85亿美元,出口总额增至33790.44亿美元。在此期间,进出口总额增长了约155.64倍,年均增长率达到约12.45%;出口总额增长了约186.48倍,年均增长率达到约12.93%。观察出口总额在全球出口市场份额中的比重,中国已从一个贸易小国跃升为贸易大国。1980年,中国出口总额在全球出口总额20017亿美元中的比重不足1%,大约为0.9%;而到了2023年,中国出口总额在全球出口总额23.8万亿美元中的比重已上升至约14.19%。从资本流动的角度来看,以利用外资和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为例。1980年,中

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为606.3亿美元,而到了2023年,这一数字已增至1632.53亿美元。相较于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虽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发展迅速。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金额为265.06亿美元,而到了2023年,这一数字已增至1772.87亿美元;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金额为1839.70亿美元,而到了2023年,这一数字已增至29553.99亿美元。

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充分验证了国际循环对生产力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生产力的发展及其体现,最终落实到具体的产业层面。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强调生产工具与劳动对象的变革,进而体现在产业结构的演进与变化中,在推动生产力变迁方面作用显著。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亦指出,产业结构的升级是生产力进步的必然结果与表现。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库发布的数据显示,1980年,中国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分别为29.6%、48.1%、22.3%;而至2023年,三次产业比重已变为7.1%、38.3%、54.6%。此外,产业结构内部的转型升级亦彰显了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如《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所公布的统计数据,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中,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0%,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12.9%,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3.4%;2023年全年服务业增加值增长5.8%,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增长高达11.9%。从技术创新的角度来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1995年发明专利申请数为21636项,而2023年发明专利申请数达到1678000项,28年间增长了约77.56倍。这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商品和要素流动性开放的国际大循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最佳经验与实践案例。

二、高水平国际循环促新质生产力发展： 流动的新要求

迈入全新的发展阶段,从全面赋能新型质态生产力发展的视角来审视,国际间的循环流动同样被赋予了全新的、更高层次的要求,即高水平国际循环畅通。这不仅体现在对传统循环模式的优化升级上,更在于对新质生产力要素的深度融合与高效

配置,从而推动全球经济的协同发展与创新突破。

1.流动的主要形式和内容

流动首先是商品与货物之间的流动,这一过程不仅涵盖了有形物品的交换,还包括了生产要素如资本、劳动力、技术等广泛流动。随着经济活动的不断深入和扩展,各种不同形式的流动开始逐渐显现并变得更加复杂多样。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由于地理环境、文化背景、政策法规等多方面的显著差异,流动的形式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这些不同的流动形式最终导致了各个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同格局和模式。具体而言,货物与商品的流动主要集中在成本优化与规模经济的实现上,或者说,通过这种流动可以实现更低成本、更大规模的经济效益。对此,经济学中的比较优势理论与规模经济理论等给予了详细的阐释和理论支持,揭示了流动背后的经济逻辑和内在机制。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商品与货物乃至人员的流动之外,流动过程中还存在一个更为重要且容易被忽视的现象,即无形之流动,亦即思想等高端创新要素的流动(为分析方便,后文统称为“思想流动”)。那么,什么是“思想流动”呢?思想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涵盖了创新思维、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等多个方面。因此,“思想流动”主要包含两层深刻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人类的创新思维、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被注入经济活动中,从而实现从“意识”到经济“实践”或从“思想”到“行动”的转变。经济活动本质上是人类的活动,当人们将创新的理念和思想注入经济活动中时,便为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和创新因素,推动了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升级。第二层含义则是指人类的发现、发明与创新在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的流动,或者是那些具备“思想”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在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的流动(而非一般意义上的人员流动)。这种思想与人才的流动,显然属于高端创新要素流动的范畴,其不仅促进了知识的传播和应用,还加速了全球经济的融合与发展,推动了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进一步提升了全球经济的整体竞争力。

2.不同的流动带来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

探究不同国家(地区)经济发展模式差异的根本原因,关键在于其流动模式的显著差异。在西方文明的早期发展阶段,商品与思想的流动往往呈现出相互独立且截然不同的特征,这种差异化的流动

模式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各具特色的经济格局。通常情况下,商品的流通相对迅速且顺畅,市场交易频繁,物流体系较为完善;而思想的传播则相对缓慢,且受到诸多如文化壁垒、信息不对称、政治干预等阻碍因素的影响。这种不对称的流动状况导致商品流通带来的市场规模扩大与生产成本下降,极大地激发了经济活力,促使大量人口纷纷投入工业化进程,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快速变革。然而,由于思想层面的流动不畅,经济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现象:少数国家(地区)凭借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等高端创新要素,迅速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并顺利迈入现代化行列;而大多数国家(地区)则因缺乏有效的知识传播和创新机制,仍深陷于贫困和落后的困境之中。与商品流通的相对快速与顺畅相比,思想流动的不畅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人类的发现、发明与创新成果未能在不同国家(地区)间广泛传播和共享,创新动力往往仅限于原创的国家(地区)内部,难以形成全球性的创新网络;其二,创新活动主要集中在少数发达国家(地区),即那些能够将创新思想、发明与发现有效融入经济活动的“思想流动”国家(地区),起初仅限于这些国家(地区),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因缺乏必要的创新能力和技术吸收能力,无法实现创新、发明与发现对经济活动的有效“思想流动”。

这一点也得到了传统国际经济学中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有力支持。该理论指出,新产品从研发到成熟再到衰退的过程,往往首先在创新国家(地区)兴起,随后逐步扩散到其他国家(地区)。因此,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地区)而言,既缺乏第一种形式的“思想流动”,即创新成果的广泛传播和共享,又缺乏促进第二种形式“思想流动”的机会和条件,即本土创新能力的培养和技术吸收能力的提升。结果正如史学家所言,在人类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大分流”的现象,生产力发展水平在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分布格局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上,更深刻地反映在科技创新能力、产业结构优化和社会进步水平等多个维度上。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宏观视角下,尽管部分国家已成功融入全球化并实现工业化,但它们尚未真正跨越“现代化”的门槛,反而加剧了南北之间的巨大发展差异。一些发展较缓的国家在经济全球化

的浪潮中逐渐被边缘化,形成了“中心—外围”的固定发展模式。自20世纪80年代起,国际分工已从以最终产品为分界的传统模式,转变为以产品生产环节与阶段为分界的主导模式,这为众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机遇。然而,这一转变并未根本改变“中心—外围”的发展模式。正如研究表明,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背景下,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旧有“中心—外围”关系,已演变为控制与被控制、主导与被主导、俘获与被俘获等新的不平等关系(刘志彪和吴福象,2018)。从本质上讲,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不同国家(地区)形成的不同经济发展格局,主要源于思想流动格局的差异。思想流动与创新仅在少数国家发生,这些国家因此成为创新的领头羊,并在全球生产力发展格局中占据领先地位;而其他国家因思想不流动,即缺乏创新,导致其经济发展长期滞后,或在全球生产力发展格局中处于落后位置。

3.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加依赖创新要素流动

商品与货物等有形要素的流动固然能够有效地推动生产力的持续发展,然而,“思想”这一无形要素的流动在塑造和提升先进生产力的过程中,却起着至关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融入国际大循环,主要推动的是商品与要素的流动型开放,这一策略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显著进步,充分展现了“流动”这一概念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深远意义。然而,随着中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为了加快推动并形成具有新质特征的生产力,从上述分析的意义来看,我们必须更加重视和依赖思想这一无形要素的流动。这是因为,从新质生产力的定义中可以明确得知,新质生产力是以创新为主导力量的生产力形态,它摆脱了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含量、高效能产出、高质量水平等显著特征,完全符合新发展理念所倡导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是由技术革命性的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的配置以及产业深度的转型升级共同催生的。它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全面提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其显著特点在于创新,关键在于质的优化,本质上是先进生产力的具体体现。

基于新质生产力的本质特征和核心要素,我们

可以清晰地认识到,发展新质生产力显然离不开发明、发现与创新,而这些正是前文所述的“思想”流动的具体表现。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与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历次工业革命引发的生产力跃迁相比,例如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电力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等所引发的生产力巨大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同样需要创新作为驱动力。然而,本轮技术革命的创新是以数字技术为主导的,因而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将更加凸显其“无形性”特征。换言之,从生产力推动“物质转换”这一根本作用的视角来看,与传统生产力相比,新质生产力所推动的“物质转换”范畴将从以有形要素为主导,逐步转变为以无形要素为主导。这不仅体现在投入方面的无形生产要素如数据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也体现为产出与需求将更加聚焦于无形的产品与服务上,特别是服务和虚拟领域的产出与消费(戴翔,2023)。正是基于这一深远意义,发展新质生产力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更加依赖“思想”这一无形要素的广泛而深入的流动。

更为关键的是,正因为要素投入、产出与需求等“物质转换”范畴逐渐趋向无形化(戴翔,2023),经济的集聚与流动得以突破传统物理空间的限制,从而展现出其无限性的一面。换言之,未来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亟须向“无形性”迈进,以超越时空的束缚。因此,加速推动并形成新质生产力,所需的流动与集聚,不仅包括有形的商品与货物,更需注重思想与创新的融入。对此,《周易》有着极为深刻的洞见,能为我们提供重要的启发与借鉴。例如,“大畜”卦的卦体结构为艮(山)上乾(天)下,象征无垠的天宇藏于有限的山中,意指所蓄聚之广博。这正是“大畜”卦得名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如何实现天藏于山?显然,山所藏非天之实体,而是天之刚健之质。正如人所能摄取的食物有限,而精神食粮的汲取却可无限扩展,思想与创新的获取亦是如此。因此,尽管发展新质生产力仍需依赖商品与货物,但受限于地理空间,其流动与集聚终究有限。若能促进思想与创新的流动与集聚,则有实现无限的可能。这一点恰好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逻辑起点与落脚点,即“物质转换”范畴从生产到消费的无形化趋势,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

实现国际大循环的畅通无阻,整合全球创新资源与要素,注入无限的思想创新于经济活动之中,不

仅能够持续拓展经济活动的边界并实现突破,而且能更有效地服务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尤为重要的是,这将推动要素配置增值力的持续提升。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全球化以要素跨境流动为特征的背景下,一国或地区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及其所能获得的贸易利益,不再仅仅取决于出口或进口的商品,而是取决于以何种层次与质量的优势要素参与国际分工。以高端与先进的生产要素参与全球化,将使一国或地区处于更有利的国际分工地位,并具备更高的价值创造能力,从而获得更多分工与贸易利益。此外,处于价值链分工高端地位,不仅意味着对价值链具有更强的控制力,还能延长价值链的国际国内分工链条,不断提升整合与利用全球资源的能力,巩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素基础。然而,在过去开放发展的过程中,即便在中国开放型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主要路径仍是“中低端嵌入”。此在特定发展阶段虽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但在新阶段,其局限性与不可持续性日益凸显。此“中低端嵌入”的路径,不仅导致资源配置增值力相对较低,而且难以构建有效的国内区域分工格局。故畅通国际大循环,提升全球资源要素的集聚流动力,尤其是促进思想与创新的流动与集聚,对于增强全球资源要素的配置增值力,进而奠定发展新质生产力所需之高端要素基础,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深远的意义。

三、国际循环促新质生产力发展: 流动的新路径

得益于技术进步等诸多因缘,尤以互联网、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先导,当前以数字技术为主导的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正迅速演进,思想流通不畅的局面开始转变,旧有的思想流通格局亦逐渐被打破。世界各国在不同程度上都面临着把握“思想”流通、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换言之,只要条件具备、战略得当,后发国家(地区)亦可借助“思想流通”的战略机遇,重塑经济发展的新优势与新格局,在以数字技术为主导的新一轮生产力“跃迁”中,即发展新质生产力中获得发展良机。这就要求中国在新的开放发展过程中,更加注重国际大循环的畅通,或者说在高水平循环畅通中促进“思想”的流通与集聚,以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

石。具体而言,宜迅速在以下几方面实现高水平的“畅通”。

1.畅通“硬件”互通渠道

在开放的国际环境中,若欲有效促进思想的跨境流通与聚集,依然离不开物质载体的关键作用。具体而言,这需要我们着力构建国与国之间的“硬件”互通渠道,以确保思想和文化能够顺畅地跨越地理界限。例如,中国积极倡议并大力推进的“一带一路”建设,其中特别强调的设施联通,涵盖了交通基础设施、能源设施以及通信设施等多个方面。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仅是物质流通的必要条件,更是促进思想跨境流通的重要基石。通过系统性地建设这些硬件设施,可以大幅降低跨国交流的各种成本,显著提升交流的效率与深度,使得不同国家间的思想交流更加顺畅与深入。同时,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也为各国之间的广泛合作提供了多元化的机会与广阔的平台。在此背景下,思想的碰撞与融合更容易频繁发生,有助于激发创新思维和解决全球性问题。无论是科技领域的突破,还是文化领域的交融,都离不开这些硬件设施的支撑。因此,在推动全球范围内的思想交流与合作过程中,我们绝不能忽视物质载体所发挥的基础性作用。相反,应当积极采取措施,加强国与国之间的“硬件”互通,为思想的跨境流通与聚集创造更为有利的基础条件与环境。

《报告》再次明确强调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其背后的逻辑意蕴显然涵盖了畅通“硬件”互通渠道。通过这样的努力,不仅能够促进各国间的思想交流与合作,还能为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具体来说,硬件设施的完善可以促进贸易便利化,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推动产业链的全球布局,从而加速推动和形成新质生产力发展奠定坚实的“硬件”基础。最终,这将有助于实现共同繁荣与进步,构建一个更加和谐与繁荣的国际社会。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并持续推进国与国之间的“硬件”互通,为全球思想资源的共享与共同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

2.畅通“软件”联通渠道

促进思想之跨境流通与聚集,硬件设施之互联互通无疑是根基所在,且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这一基础性建设为信息的顺畅传递以及人员的便捷交流提供了必要的物理支撑,构成了跨境交流的

初步框架。然而,相较于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跨境流通,创新理念、发明成果、科学发现等思想的跨境流通,实际上更加依赖制度层面的构建、规则的统一、标准的对接以及管理机制的协调与一致(戴翔等,2024)。这是因为思想的传播与交流,不仅仅需要物理通道的支持,更需要一个透明、高效、互信的“软件”环境作为坚实保障。只有在制度层面达成广泛共识,确保规则与标准得到相互认可,管理机制实现协调一致,才能真正畅通无阻地打通“软件”联通的渠道,使得思想能够在无障碍的环境中跨境流通与聚集,从而有效激发创新活力。因此,在推动思想跨境流通的过程中,各国应积极加强政策层面的沟通与协调,深化多领域、多层次的合作,共同构建一个有利于思想自由交流与碰撞的制度框架。

《报告》明确强调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无疑就是畅通“软件”联通渠道的重要开放举措,这其中包括但不限于推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国际合作,以确保各类创新成果能够得到充分尊重与有效保护;加强教育、科研等领域的深入交流与合作,以促进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与知识的广泛共享;同时,还应大力推动文化交流与互鉴,以增进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相互理解与信任,为思想的跨境流通营造一个更加开放、包容的社会氛围。通过这些综合性的努力,我们能够思想的跨境流通与聚集提供更加坚实的支撑体系,推动全球范围内的创新合作不断向前发展,进而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发展提供不可或缺的制度性保障。

3.畅通“数字”流通渠道

如前所述,新质生产力乃是在数字技术引领的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浪潮的强劲推动下,实现的生产力的“跃迁”与质的飞跃。这一过程不仅标志着生产力水平的显著提升,更体现了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未来的创新、发明与发现,将越来越多地依托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与深度发展,数字技术将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数字或数据将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过程中扮演至关紧要且不可替代的角色,成为其中的关键投入要素。与传统生产要素(如土地、人力、资本、技艺等)相比,数据要素展现出一系列独特而显著的特性,包括非竞争性、非消耗性、外部性、流动性、虚拟性以及边际效益递减等(戴翔和马皓巍,2024)。这些特性使得数据要素

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过程中,不仅直接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投入,发挥直接的推动作用;同时,在经济运行体系中,数据要素犹如一座桥梁,连接起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基石与关键构成部分,发挥间接而深远的影响与作用。数据要素的这些独特特性和双重作用,使其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中占据了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正是由于这些独特特性和双重作用,数据要素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中占据了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因此,我们必须加速畅通“数字”流动渠道,大力发展数字贸易,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加快推动数据生产要素的跨境流动。《报告》明确提出“培育绿色贸易、数字贸易等新增长点”的战略举措,无疑说明畅通“数字”流通渠道的重要作用。为此,需要积极探索国际合作的新模式,推动形成公平、开放、透明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则,通过多边协商、技术互认等途径,促进数据资源的全球共享与高效利用。这不仅有助于各国共同应对数字化时代的挑战与机遇,还能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乃至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作出更多的探索与应用贡献。通过这些努力,我们有望构建一个更加紧密、高效、互惠的全球数字经济体系,推动人类社会迈向更加繁荣和可持续的未来。

4.畅通“产业”合作渠道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进程,不仅体现在那些具有前瞻性视野和战略意义深远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未来产业领域,同时也渗透和融入我们日常所熟知的传统产业中。更为具体和确切地说,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成长与壮大,最终必须依赖具体而实在的产业载体,无论是处于蓬勃发展中的新兴产业,还是历经岁月沉淀的传统产业,都构成了其不可或缺的重要立足点和支撑基础。也正因如此,《报告》明确强调要“优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布局”,进而蕴含了畅通“产业”合作渠道的关键性作用。从宏观的战略视角来审视,中国应当持续扩大并强化其向东开放的战略优势,即在不断深化与发达国家之间产业合作的基础上,也应积极谋划并开启向西开放的战略新篇章,主动拓展与更为广泛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产能合作空间。这一系列战略性的举措,不仅成为高水平畅通国际大循环的重要表征和核心内容,更是推动思想跨境流动、促进全球智慧交融的必然要求和关键路径。对于加速新质生产

力的形成、发展与壮大,这些举措无疑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它们将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以及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劲的动力和活力。在这一过程中,通过思想的跨境流动和全球智慧的交融碰撞,能够激发出更多的创新灵感和合作机遇,为新质生产力的不断涌现和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和动力源泉。总而言之,中国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道路上,正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和更加务实有效的行动,为推动全球经济的繁荣与发展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和智慧。

必须明确指出的是,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绝非采取一种简单划一、不加区分的“一刀切”方式,而是应当根据各地的具体条件和实际情况,灵活施策,因地制宜地制定相应的策略和措施。因此,在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和操作细节时,我们还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调研和分析,充分考虑并尊重不同地区之间在经济基础、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等方面的差异性,以及不同行业、不同企业在发展水平、技术能力、市场定位等方面的独特性。只有在这样全面而细致的考量基础上,我们才能探索和制定出更加符合实际、更加具有针对性的多种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实践路径,从而确保这些路径在实施过程中能够更加扎实、更加稳健地推进,

真正发挥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 [1]戴翔,刘长鹏,成鹏东.制度型开放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理论与实证[J].财贸研究,2024,35(5).
- [2]戴翔,马皓巍.FTA 环保条款异质性、内外有别与出口绿色转型[J].中国工业经济,2024(4).
- [3]戴翔.以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J].天津社会科学,2023(6).
- [4]黄承梁,安黎哲,沈满洪.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浙江的发展与完善[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4,34(10).
- [5]刘志彪,吴福象.“一带一路”倡议下全球价值链的双重嵌入[J].中国社会科学,2018(8).
- [6]马福运.深入挖掘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J].红旗文稿,2024(19).
- [7]习近平.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J].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24,49(4).
- [8]习近平.开放共创繁荣 创新引领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J].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8(5).
- [9]周建新.国际精准传播的内涵特征、方向立场与能力塑造[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4,46(10).
- [10]金碚.论“新质生产力”的国家方略政策取向[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4(2).
- [11]金碚.以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焕发区域发展新动能的重要机理[J].区域经济评论,2019(1).

High-Level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Logic and Practical Path

Dai Xiang Song Yue

Abstract: Openness is a prominent hallmark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nd an inevitable path to national prosperity and strength. The series of strategic plans regarding “expanding high-level opening-up” in the “2025 State Council Government Work Report” are essentially aimed at facilitating the smooth flow of high-level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 thereby aligning with the policy orientation of developing new productive forces. From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or from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economy, or from the practical logic analysis of China’s productive forces developmen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essential significance of productive forces development can be attributed to “flow”. With “flow” as a new perspective, the promotion of productive forces development in an open environment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unimpeded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 Specifically, flow encompasses not only the circulation of goods, commodities, and production factors, but also the flow of ideas such as innovation, invention, and discovery. The latter plays a leading and crucial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advanced productive forces, especially in seizing opportunit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productive forces. Therefore, China should further intensify efforts in facilitating the “hardware” interconnectivity, improving “software” connections, promoting “digital” circulation, and strengthening “industrial” cooperation, to advance the smooth flow of high-level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 thereby fundamentally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accelerating the promotion and formation of new productive forces development.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deological Innovation

(责任编辑:平 萍)